



编者按

环保组织“打苹果”的背后

唐昊（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 副秘书长）

日前，5 家中国环保组织，包括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环友科技和南京绿石等共同发布了一份题为《苹果的另一面——污染在幕后蔓延》的报告。在这份对苹果在华供应链污染和毒害的调查报告中，环保组织对 10 个案例进行现场调查。报告显示，多达 27 家苹果疑似供应商出现过环境问题。涉及的苹果供应商和疑似供应商包括广州名幸电子、武汉名幸电子、凯达电子和鼎鑫电子、太原富士康、揖斐电电子北京公司和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等多家工厂。

这份环境报告所强调的是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应承担的环境责任。但问题是：苹果公司的全球产业分工本身就是资本逃避责任的产物，在此局面下很难指望其在中国主动负上社会责任。在苹果的创意产业链条中，设计端当然是被苹果公司自己所掌控，但生产端却存在于中国大陆。这样的安排除了将链条中的环境污染部分外移外，还有助于跨国公司减轻自己的两个负担：工资负担和税收负担环境负担。前者是工人生活水平、经济能力等的直接来源，而后者则是社会治理资金的直接来源。从某个角度来说，所谓跨国经营的本质就是：跨国公司通过逃避在本国承担对工人的责任和对国家的责任而赚取利润。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美国学者忧虑，美国经济中的创造性并不能帮助美国夺回经济权力，因为大多数生产企业仍然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而无生产企业支撑的创造产业存在巨大的依赖性。所以，在跨国公司飞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并未因此而掌控更大的经济权力，当然中国也一样，这种的经济权力的主导者乃是跨国公司本身。与经济权力的分布相一致的是，在整个苹果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链条中，是苹果公司而不是其他企业或国家获得了最大的利润。而从经济和社会伦理的角度，作为产业链条的主导者，苹果享有最大的经济权力，也无疑要对这条由其控制的工业污染链条负上最大的责任。

但如前所述，掌握的超级经济权力、并且以逃避社会责任为赚钱方式的跨国公司虽然有可能主动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但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一是社会责任的担负一般发生在资本运营的阶段结束之后而不是期间或之前。如卡耐基、洛克菲勒家族、盖茨等人，都是在其企业王国已经缔造、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转向慈善事业的。另外，还有许多企业并不选择主动担负社会责任。作为多款苹果产品的使用者，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些企业中就包括苹果公司。

在过去几年苹果获得超额利润并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的同时，却没有较大规模的捐赠活动的记录，公益慈善意识比较淡薄。而事实上，中国环保组织关于苹果供应商企业污染情况的的发布也已经是第二次了。在今年一月份的同类报告中指出苹果的供应商存在着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劳工权益三方面的重大问题。但苹果公司对此却拒绝回应。而在过去 7 个月中，苹果公司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善。污染排放正随其供应链的膨胀而在中国蔓延，给当地环境和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从技术上讲，苹果不可能对供应商所存在的人权问题（如富士康跳楼事件）、污染问题毫不知情。但苹果虽然承认自己供应链上有问题，却没有对政策做出任何调整，和给供应商加强制约。而是坚持继续使用严重污染的企业作供应商，以中国环境与公众的健康作代价，攫取超额利润。而污染的受害者对此显得无能为力。在本次调查中，就有罹患胃癌、胃已经切除的村民朱桂芬手持装满污水的饮料瓶，带着十几位中老年村民向调查者下跪求助：“求求你们，帮帮我们，帮帮我们老百姓”。

大型企业也必须要外部力量的制约，才不至于因资本的贪婪本性而使自己迷失方向。这些外部力量包括公民环境意识提升、环境 NGO 的发展、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等。如前所述，跨国公司由于其跨国的性质而有机会逃避很多制约。同时，中国大陆的大规模生产企业环境问题的出现，既与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有关，也是中国自身产业政策的结果。即由于对私营企业的发展在资金技术上缺乏支持，中国的私营企业无法转型升级，而只能低水平地重复简单加工，成为苹果等跨国公司的代工厂。甚至在上游产业挤压利润的情况下并不赚钱，而只是通过拼命挤压工人待遇、污染环境来维持生存。而作为环境执法者，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者为地方的 GDP 和政绩考虑，对于环境污染企业缺乏严格的监管。这些因素都导致跨国企业对自身的社会责任缺乏明确的认识，而在环境问题上抱持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法律缺位、行政乏力的情况下，公民只能自己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无法经由企业和政府等传统的组织性机构来解决，人民才不得已转求诸己，通过社会自组织来发现问题、施加压力、保护公民利益、促成问题的解决。中国 NGO 的成长速度之快，正是与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有关。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的环境问题上，中国的环保 NGO 发出自己更加响亮的声音，并且已经开始进入到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的阶段了。例如，这次对苹果公司的调查报告就在刚刚结束的中欧环境论坛中对国内和国际的 NGO 都有所交代，并取得了其他组织的支持。NGO 之间的联合、议题的倡导计划，都已提上日程。

和单纯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相比较，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蕴涵着改变社会的更大能量。但这种能量如何才能从正面发挥出来？公民的环境参与以何种方式为最佳？社会动员与既有机制如何互动？这些都还是亟待探讨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证明，这种参与必须是多元的，而不能总是通过街头抗议活动；而在社会动员方面，教育也比集体行动更有长期效果等等。也是在这些国家，公众环境参与的常规化和组织化已经改变了企业和企业家的理念和行为。照这个路数来看，中国的环保 NGO 应该能够做到的一件事，就是用自身的价值体系去摧毁对方在市场上业已建立的价值体系，让公益价值引导商业价值和时尚价值。目前的这份报告所做的正是这类事情。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历史上，洛克菲勒家族、卡耐基、盖茨等人，都是在自

己的企业王国经由残酷的经济竞争而胜出之后，才转向慈善事业的。而现今的社会对这些企业和企业家们的要求要更进一步——在企业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就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事后的慈善。在这个意义上，NGO 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正在帮助在华企业塑造其全新的企业社会伦理。

COP动态

2011年8月23—25日 “环境与健康” 中欧对话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与德国亚洲基金会共同举办，邀请了 50 位来自中国和欧洲的民间组织代表、政府官员及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有关环境与健康的问题。

工作坊第一天分享了中国和欧洲在环境与健康方面的政策挑战和公民行动，并确定讨论的整体框架；第二天透过案例分析和互动交流的形式，探讨解决食品安全领域问题的具体方法、策略和最佳实践，尤其在如何发挥媒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天的圆桌论坛围绕“政府、NGO 和公民的角色和作用”展开，公共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提出“绿色选择联盟”项目，该项目以动态更新的 IPE 数据库为基础，开发出一套系统性解决方案，使得企业和公民可以更加有效地发现环境违规的供应商，并通过透明、参与式的方式对其进行审核，促使污染问题得到解决。目前绿色选择项目投入的最大精力是关于苹果在华供应链的污染和毒害问题，旨在追踪其在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足迹。

为期三天的工作坊以“工业污染与食品安全”为主题，分享了中欧双方在解决环保问题方面的成功案例和研究成果，并共同探讨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在解决环境议题上的角色

定位。与此同时，通过跨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国和欧洲的相互了解，从而为未来共同应对严峻的环境和健康问题奠定了平等对话的基础。

COP观点

中国环境健康、相关政策及挑战的综述

May Tan—Mullins（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研究学院 讲师）

环保议题在中国引起极大的关注，中国政府在建立环保政策方面做了比较多的工作。比如在未来五年计划里面，政府把重点逐渐从经济发展转移到社会、人类和环境方面，建立一个环保性的发展计划；同时，政府也提出了循环经济（资源的循环利用）的概念，希望 2015 年碳排放能减少 17%，并把非石化燃料能源比例提高到 11.4%等。

而政府法规和执行方面的脱节、信息的缺乏是解决中国环保问题的两大挑战。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很多事情政府和企业界是不可能单独完成的，一定需要由民间社会组织去做，民间组织相当于政府的左右手，可以提供额外的监督，比如可以对一些环境议题提供评论，参与环境方面的工作。此外，执行也不应该仅仅是政府的工作，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包括新闻媒体也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企业界、社会组织和政府需要平等对话的平台，了解不同主体的想法，确保一个共识，应该先做哪些事情，从哪里开始做，尤其对于本地民间社会组织如何同国际 NGO 进行知识上技术上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欧洲在环境与健康方面的公民行动

Charlie Clutterbuck（行业环保实践 主任）

民间社会、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体现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工会、公司、非政府机构、国家作为系统中的一个面向，应该互相支持，共同协作解决环境议题。国家主要是停止一些最严重的污染，制止一些最恶性的局面，而很多日常层面的不良局面并不是都能够触动国家层面的官员，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遏制这些日常的不良行为。而如何让公民社会组织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发挥它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公民社会不单只是指 NGO，还包括其他的组织，例如贸易组织、妇女组织、宗教组织，以及一些行业的组织。行业在做环保实践的时候也可以与政府有良好的互动。例如 ISO14000 就是一个行业标准。它可以帮助我们停止或者遏制一些污染，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法规设立行动方案，使这些标准和政府规则之间建立联系。NGO 在这方面可以进行宣传，起到倡导的功能。例如以前大家都不知道聚氯乙烯(PVC)的毒性，但经过 NGO 的倡导之后，大部分人都认识到这种危险化学品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另外学界也可以为 NGO 的倡导、行业的标准制定以及政府的政策出台提供专业的意见。总之，政府与民间，包括行业、NGO 和学界之间需要寻求更多的互动和相互支持，共同协作解决环境议题。

自媒体时代：食品安全的机遇与挑战

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正义网络传媒研究员执行院长）

自媒体是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事实的新闻途径。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体现为平民化（以普通用户为主）、圈群化（以交际圈进行传播）、个性化（个人的表达为主）和随行化（没有时空和形式的限制）四个特点。在这样的自媒体时代，实现了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消息源，人人都有麦克风，也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所有能够接触网络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非常低门槛的发表平台，也使得政府部门在控制信息的披露上显的越来越无力。

在食品安全领域，自媒体时代为及时发现并督促解决食品安全危机和环境污染事件带来新的机遇。我们过重注重中央，忽视地方，现在我们突然发现地方不再是“地方”，在互联网中没有角落，只要是发生一件为我们所关注的食品危机事件，或者环境污染事件，在条件达到的时候迅速成为全国公众瞩目的焦点。

网络信息传播具有自我净化功能，但这种净化也需要多方参与。NGO 应不断强化自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为网络信息的净化做出贡献；政府部门应充分尊重网络社会的自生秩序，善待网络，善用网络，放下身段，推进合作。在信息公开、官民互动、公正执法和危机应对等诸多方面，政府部门应谨守权力的边界，个人、社会、市场、行政、司法各享其权，各尽其责。如果政府部门不情愿这么做，那就依靠民意的力量推动它走在既定的轨道上。

媒体角色和信息管理

Isabel Hilton（中外对话 总编）

当你去使用媒体的时候，要关注媒体的限制，特别是从一个长期的，而且是在不断转变环境当中，媒体的力量是有所限制的。限制首先体现在工作时间内。公共环境危机发生后，媒体需要马上进入参与这些事件，从而找出问题的来源和原因，由此媒体建立并保持自身的话语权。而我们知道环境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但媒体的工作时间是很有限的，要在短时间内找出这些原因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其次是科学和媒体间的张力。科学实际上是一个质疑的文化，科学家不会说什么东西是完全确定的，这就导致一些不正当错误的支持，对媒体的客观性提出了很多的压力；此外新闻工作者本身没有或拥有较少的科学知识背景，这也对报道产生很大限制。再次当地环境上的限制。例如在中国很多贫困的地区，政府需要去招商引资，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发展，如果当地受到政府的控制，或者公司的控制，媒体则很难干预这个地区的情况。最后还有一点是文化上的冲突。比如在中国记者自身也会参与发起一些活动，但在欧洲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欧洲希望记者能够更加客观，减少自身的主观性在其中。

总之，我们的 NGO 应该和媒体保持良好的联系，同时认识到媒体的限制。媒体也应该要有科学的基本知识，要知道确定性、可能性和概率性的问题，即判断所谓的科学家提出一些信息到底是不是可信的，否则就会对环境健康方面提供一些不是很可靠的信息来源。

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信息公开是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

马军（公共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个经济奇迹对生态环境施加了很大压力，环境污染也会影响到社会稳定，造成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由此看来环境污染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一个资金的问题，现在解决环境问题最重要的障碍是缺乏动力，通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提供一个新的动力已成为全社会的一个共识。

现在要想公众有效的参与，必须要有环境信息的公开，环境信息公开是被用作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订立了一系列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法规政策，比如上海市环保局已经开始定期公布污染企业的名单，武汉市将在线监测的数据放在互联网上，让公众可以看到重点企业每天的排放是不是能够达到标准，福州政府也将公众投诉举报的信息放到网上，在多个来源的基础之上，把这些点点滴滴的信息汇聚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企业环境监管的记录。

针对企业的工作要经历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第一步针对单个的生产企业，给他们以压力，推动他们解决问题，这种做法效率是比较低的；第二步发展成供应链，通过一个供应链影响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供应商；第三步是诸多的环保组织合作，推动整个行业发生转变。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公共环境研究中心和 20 家环保组织在 2007 年的时候共同发出了一个绿色选择的倡议，倡议消费者能够用绿色消费去拉动绿色生产，同时倡议这些大型的企业能够绿化它的供应链，给消费者提供真正绿色的产品。总之，中国环境危害的挑战是真实而严峻的，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政府的作为，中国民间 NGO 组织的积极努力，这些都创造了一个促进公众有效参与的机会，让公众和社会各界都能够做出一个绿色的选择。

推荐人物

马军

马军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的实践和研究，是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在海外媒体工作期间，对中国环境和资源状况做跟踪研究，完成《中国水危机》一书，阐述了中国七大流域面临的水资源问题。之后为在华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有关中国环境、健康和安 (EHS) 相关政策 and 法律的咨询服务，并致力于为跨国企业在华的供货商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评价体系，以其开展环境、健康、安全和劳工权益的审核。2006 年马军出任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 (IPE) 主任，领导编写了我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并开发运行了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旨在促进企业、政府和公众三方在良性互动和博弈中实现发展和环保的平衡，来促进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2008 年 IPE 建立绿色选择联盟，将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融入现行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中，促进中国制造业提升环境表现，实现节能



减排。在迈入全球化生产的新时代，绿色选择联盟意在推动各利益方广泛合作，建立了全球供应链条环境管理的新型模式。马军开辟了一条政府信息公开和环境信息公众参与的新思路，其背后的广阔图景是构建政府、企业、公民的联动协商和平等对话，共同致力于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

COP链接

《苹果的另一面 2——污染在黑幕下蔓延》[pdf] 的报告

链接：<http://www.ipe.org.cn/Upload/Report-IT-V-Apple-II.pdf>

8月31日，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环友科技和南京绿石5家中国环保组织共同发布了一份题为《苹果的另一面 2——污染在黑幕下蔓延》[pdf]的报告。报告中称，调研发现，部分苹果供应商的污染已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多家苹果的疑似供应商成为当地社区集中投诉的对象，一批苹果公司的疑似供应商危险废物产生量特别巨大，其中部分企业危险废物未能妥善处置。